

第六章 結論

在中國大陸的學術氛圍中，歷史研究與當前政治的關係，往往被綁在一起。數十年來在中共黨內，包括 1945 年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5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定、寫成的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及 1981 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這些正式文件無不以歷史總結為題，作為路線調整和轉換的思想準備，同時這些文件似乎也調整了相關領域的研究界限。如今中國大陸歷經改革開放，中共的歷史檔案管制，以及歷史研究的空間，都比以往開放許多，歷史研究也比以往活潑，過去在政治上不敢碰觸的禁區，中國大陸學者也比較能勇於探索。但是由於兩個因素，使得研究中共歷史，依舊產生了無形的限制。一是 1981 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有形無形間成為了目前中國大陸學界歷史研究的基本解釋框架，至今仍是影響深遠。除了少數獨立的研究者之外，許多較為制式性的歷史教科書或研究文章，基本上都力求與此一解釋框架一致，如此一來將造成歷史事件解釋上的侷限，有時甚至會為了符合此一基本框架而簡化、扭曲歷史。一是鄧小平提出的「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要以大局為重。」¹這種具有政治考量的「宜粗不宜細」，在歷史研究上，對於了解事實真相，有很大的障礙。在台灣研究中共歷史，自然沒有這些限制，因而有了自成一格的發展空間。

筆者認為，歷史研究的價值始終在於求真，而歷史教學的目的則在於傳真。但此一真實，絕難全然客觀中立，更難達到百分之百無誤。了解研究者本身的侷限，時時對自己觀照的研究主題進行反思、一再考辨探索，雖然不可能面面俱到，至少提供後人研究之起點。本文對於馬寅初事件，根據原始材料的分析與各種二手材料的比較對照，提出了一個較為多面向的看待與解釋，這便是「多重解讀」的初衷，同時也只是對馬寅初事件進行「多重解讀」的起點。一方面，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發生在具體的時空當中，總是多方面因果關係的綜合體，絕非某單一或少數面向所可涵括。另一方面，隨著歷史和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人類看待歷史的角度和觀點，也會不斷更新，依此嶄新的視角進行解讀，重新看待過往的歷史，就會形新的解釋。因此，多重解讀是一個無止境的歷史研究態度，它不斷使人們對歷史事件的了解更加深刻，同時也將賦予歷史事件更豐富的意義。

基於上述的認知，本文一方面重新爬梳原始材料，一方面仔細比對分析各種

¹ 此話出自 1978 年 12 月 1 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會，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 上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 227。

既定解釋之間的矛盾之處，重新確認馬寅初事件的若干歷史事實：

- 一，馬寅初事件雖然在時間點上與反右運動有所重疊，但是不論在性質上或者是內容上，都與反右運動無關，而與 1958 年學術界的興無滅資運動更為有關。
- 二，馬寅初有關計劃生育的主張，並非首倡，中共黨內的毛澤東，中共黨外的邵力子等人，比起馬寅初，在中共建政後對人口問題的重視，在時間點上都比馬寅初要早。毛澤東自始至終，始終強調要有計劃地控制人口。
- 三，中共在批判馬寅初之前或之後，對人口控制的工作儘管鬆緊有別，但從未放棄，直到 1962 年，計劃生育成爲既定的政策路線。

其中第一點爲筆者首倡，第二、三點的類似論點則曾散見各處，但尙未有能較爲全面論証者。基於上述對歷史事實的重新確認，筆者試圖從各種橫向和縱向角度重新理解馬寅初事件。

就縱向而言，首先，馬寅初事件背後所呈現出來的，是中國大陸人口研究典範的領導權爭奪戰，即自民國初年以來，馬爾薩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人口問題之詮釋權之爭。歷經四十年，馬克思主義終於取得優勢，但是取得優勢的原因，與其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的堅實性和理論的解釋能力所致，不如說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運作是更具決定性的。此外，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極欲將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改造成馬克思主義者，並在意識型態領域上取得主導權，1960 年陸平取代馬寅初成爲北京大學校長，是中共黨員擔任北大校長的首例。

其次，中共歷經 1920-1950 年代間三十年的變化，從一個知識份子爲主的團體，轉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和組織化的政治團體，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也產生了轉變。馬寅初作爲一位知識份子，與其他同類型的傾左知識份子，在中共建政之後，政治上日漸認同中共，在思想上自覺地馬克思主義化，但多數不爲那些更早轉向馬克思主義、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詮釋權的人所接納，最終，大多在文革以前，便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擠和批判。

就橫向而言，必須考慮到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其論述之重心與所針對之問題，表面上是人口，實際上他更爲在意的是中國大陸當時經濟積累的效率，因爲這將影響中國大陸工業化的速度。批評馬寅初的大多數人，不但誤解、甚至扭曲了馬寅初的初衷。馬寅初贊成要提高積累，只是所採取的方式是從控制人口入手。

基於上述發現，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爲何目前中國大陸充斥著「馬寅初因

與毛澤東觀點對立而遭到批判」的說法。筆者認為是在下面兩個情況下造成的：

一、把毛澤東的觀點和馬寅初的觀點對立起來，最早源自 1958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報署名叔仲的文章。這種做法幾乎是中共早年批判文章寫作的標準做法：要證明此人說法為錯誤，常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強調此人與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觀點是對立的。然而如果我們細加比較毛澤東長時期以來關於人口問題的看法，便可清楚理解，叔仲的做法是斷章取義。從第三章的分析可知，那些批評馬寅初問題的人，雖然的確有少數人有極高的經濟理論造詣，但是如果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標準來看，就連張培剛這一類造詣高的人，也難免會在其論証上出現片面性和方法的錯誤，更遑論像叔仲一類的人。1980 年代以後，馬寅初被平反，先是早期幾個馬寅初的傳記作者，如楊建業、鄧加榮等，在其傳記中直接點名陳伯達和康生在馬寅初事件所扮演的角色，並透露周恩來對馬寅初始終親近、關切和保護。此後其他二手詮釋的文章，或從未註明出處的回憶文章，透過康生、陳伯達與毛澤東在文革時的關係，連繫上了毛澤東，再把毛澤東的隻言片語拿出來與馬寅初的隻言片語相對照，「毛澤東與馬寅初的觀點對立並打擊馬寅初」的形象塑造，至此大體完成。此後報章和網路文章互相傳抄，形成了此一極為廣泛的見解，其中又以賀吉元的文章影響最為廣泛。這是一個「人為創造歷史」(The making)的過程，此一手法在古今中外所在多有，馬寅初事件可說是又一例証。²此一過程或者出於有心，或者出於無意，在此不論，重點是這樣的觀點經過較為細密的考辨之後，往往是站不住腳的。

二、1982 年，馬寅初去世，享年 101 歲，臨終前被譽為「計劃生育第一人」。而自他被平反至去世期間，正是中共形成「一胎化政策」的重要階段。1978 年，中共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指導思想，使之提高到中共國策的高度，同時在理論上提出了「兩種生產一起抓」的思想（「兩種生產」指的是自然生產即人口生殖，與社會生產即經濟生產）。1979 年，中共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提出「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並用立法形式將實行計劃生育固定下來。1980 年，中共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還規定最低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 22 周歲，女不得早於 20 周歲，以晚婚延長代間期。³1981 年，「中國人口學會」成立，首任會長是許滌新，並推舉馬寅初為名譽會長，人口研究再次成為重要科目。平反馬寅初，似乎是為了新時期的人口政策作輿論準備，並且按照中共的慣例，一定要把批判馬寅初與過往毛澤東晚年的「左」

² 關於人為創造歷史或傳統的討論，民國初年的古史辯論即可見一般。西方歷史的創造，詳見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2).

³ 沈益民、童乘珠，「中國人口問題——計劃生育與人口遷移政策」，*人口研究通訊*（北京），1998 年 7 月，總第 21 期，頁 16。

傾錯誤連結一氣，以示新時期的作為與舊時期不同。此舉或許有中共內部政治上的若干考量，但與歷史實況不符。

對筆者而言，馬寅初事件的多重解讀，毋寧只是對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研究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之際，正處於中國多事之秋，而其成立之初，又多以知識份子為主。對當時的中共而言，馬列主義到底是救國之策，抑或是他們所信奉的世界觀？若是前者，則實用成分大於思想成分，那麼「富國強兵」這一類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目標，就成為其大政方針的的基準點。若是後者，則「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類的革命主張，將會是他們念茲在茲的事。儘管筆者相信，在中共高層當中，多數會認為這兩個目標是可以並行不悖、相輔相成，但是具體到個人來看，在哪些人心中，無產階級專政會大於富國強兵，而又是哪些人會把富國強兵放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前？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最終將導致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知識份子的問題上產生不同的偏重點。前一種態度將著重把知識份子馬克思主義化，後一種態度則更加重視知識份子為社會主義建設而服務。因此，哪一種傾向在中共黨內佔上風，將會使得黨外知識份子的地位發生變化：當前一種佔上風時，文藝批判、馬克思主義學習會等活動將會活躍起來；當後一種佔上風時，相對而言則較為風平浪靜。前一種傾向，毛澤東是最為明顯的代表，而後一種傾向，目前似乎難以辨認。更進一步來講，儘管就結果而言，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與黨外知識份子之間大體呈現出眾所周知的緊張態勢，然而細究其中，將發現此一緊張態勢，除了意識型態上的不同所致之外，至少還包括這些知識份子本身何時開始認同中共、認同中共的什麼內容、是組織認同還是思想認同等。而這些差別，多多少少也受到上述傾向問題的影響。

筆者相信，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共與知識份子的總體關係，將會有新的體會。